

初心无悔（上）



游览颐和园

2019年将迎来巨港北京校友会30周年华诞，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校友会理事会决定出版《特刊》以示纪念。作为晚辈，一直以来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在前辈老师们面前班门弄斧写东西。可如今屈指一算，回国已经50多年了，确实到了动笔记录一下这半个多世纪历程的时候了。

1960年的圣诞节，我出生在印尼巨港。据父母讲，我是在巨港中学的教职员宿舍诞生的，而不是在医院，为此我曾开玩笑地埋怨过父母对我的不重视。我不曾在巨港上过学，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巨港校友，但确实与巨港华校有着不解之缘。我的父亲沈慧争曾在巨港一小、八

小、巨港中学任教，我的外公黄云峰是巨港中华学校教龄最长的资深教师，据说我的外婆林必敬和我的母亲黄雯雯也曾在巨港第八小学任过职，我又是诞生在巨港中学的校园里，所以称之为巨港校友也不为过吧？

我的父亲一生追求进步思想，向往祖国，他是我人生中的启蒙老师。在我们几个子女中，我是独子，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下面有三个妹妹。父母分别以“红”和“专”为我们姐弟俩命名，其寓意可想而知，这也注定了我们姐弟俩的人生从此永远捆绑在一起。我们的家是随着父亲教书地点的变动而变动，从巨港搬到

楠榜，又从楠榜搬到了雅加达。在印尼家中我们只讲华语不会讲也听不懂印尼话。父亲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他对我们非常严格，如果不好好学偶尔会棍棒相加。他教会我们说华语、写中文，记得那时的我们居然能够完整地背诵《老三篇》（《老三篇》是由毛泽东写的三篇短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我们回国后之所以能够很快适应国内学校环境，应该拜我父亲所赐。回国前，父亲经常会带我们姐弟俩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那里看过早期的中国电影，我们都非常喜欢去。

1967年7月27日，带着父母“回国读书学好本领，长大后为祖国做贡献”的期望，在奶奶的带领下，我们姐弟俩告别父母，拖着沉重的行李，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从雅加达机场起飞，经停柬埔寨金边，经过漫长的飞行，于7月28日到达广州，从此投入到了祖国的怀抱，开始了全新而又陌生的生活。回国时我6岁半，对于回国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虽有些印象，但却很模糊，没有姐姐记得清

楚。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此次离开父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父母回忆起这一段时曾说我是非常高兴地离开雅加达、离开父母的，就像去旅游一样开心，没有丝毫离别之痛苦，谁曾想这一别就是十年没有再见到我们的父母。当时我的二姑和两个叔叔已先期回国，姑姑沈旭英在北京工作，叔叔沈干争、沈镜争均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我们回国是要到北京投奔姑姑。到达广州后，所有归侨都安排在三元里接待站，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我们终于可以启程去北京了。我们是坐火车北上的，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期，从车厢门进去根本不可能，我的叔叔只好从车窗把我们“顺”进去。车厢里挤满了人，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没有下脚的地方，还充满了浑浊的气味，没有座位坐，我们只好躺在座位下。在叔叔的一路护送下，我们总算安全抵达祖国的首都——北京。

到北京后不久，天气逐渐转凉，由于没有过冬经验，又不适应这里干燥的气候，我们的手脚都被冻伤了，奇痒无比，

嘴唇也干裂开了，十分痛苦，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个冬天才逐步适应。另外，我们刚回国时，不会使用筷子，是用两只手一只手拿一根筷子去夹菜，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笑的。

在姑姑不懈的努力下，1968年2月我们才在北京上了户口，有了户口我们才得以进学校上学。1968年至1972年间，先后在宣武区宣外大街小学、海淀区马神庙小学就读。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也许是为了分担姑姑一家的经济压力（姑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许姑姑一家有了去香港的打算，1972年底，已分配到河南郑州铁路局洛阳分局工作的四叔沈干争把我接到了洛阳，承担起了抚养我的责任。那个时候我的姑姑和叔叔都分别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生活本不富裕，还要负担我们，实属不易。而且我小时候可能也是淘气倔犟，经常会惹他们生气，长大后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万分愧疚。借此机会，在这里我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